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的指导

○ 刘 派(吉林)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其前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这支队伍孤悬敌后,又长期处于与中共中央失联的困难环境下,但中共中央从抗联刚成立起就一直密切关注着其动向,并对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和历史功绩作出了高度肯定。而东北抗日联军及其领导人亦一直全力搜集毛泽东与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出的战略决策及理论著作,并结合抗联斗争实际加以贯彻。这些理论不仅为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提供了战略及战术上的指导,亦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在邝任农的领导下,到1965年初,中国民航总局开辟了以周边国家为主的10条国际航线。3月23日,周恩来在乘坐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专机赴罗马尼亚访问途中,指示中国民航“一定要飞出去”“打开局面”。为了落实周恩来的指示,邝任农展开了全方位、满负荷的工作。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中国民航总局于6月使用伊尔-18型飞机,首次执行了周恩来访问非洲坦桑尼亚的专机任务。临上飞机前,周恩来对来送行的邝任农亲切地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回到北京后,他又郑重地对邝任农说:“你们组织得很好,任务完成得很好。民航局第一次飞非洲,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一次

不是走得很好嘛!”周恩来的话让邝任农备受鼓舞。7月,中国民航总局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承担了邓小平访问罗马尼亚的专机任务。这两次专机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使民航总局取得了飞往亚、非、欧3洲的初步经验,为中国民航开辟远程国际航线奠定了技术基础,并预示着中国民航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即将到来。

1973年3月,周恩来指示中国民航总局和外交部:“北京逐步对外开放,允许通航我国的外航班机开航至北京。”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在邝任农和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航工作的着力点开始放在莫斯科、东京、巴黎、地拉那等4条航线的准备工作

上。邝任农为实现周恩来提出的“飞出去”的战略目标,殚精竭虑、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中央考虑到邝任农的身体情况,于6月免去了他民航总局局长职务。63岁的邝任农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回空军工作。

1975年,邝任农光荣退居“二线”,担任空军顾问。然而,他人退思想不退,尽其所能,下部队、搞调研,在空防、航管、机场、仓库、车辆、营房、边防营区建设等方面,向空军领导提出了许多合理化的建议。1983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邝任农离职休养。2003年4月26日,邝任农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责任编辑:计媛媛)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部指战员 1939 年的合影

—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采取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行为，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一切重要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号召白军与红军共同抗日。这份宣言与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与讲话，对东北民众的反日情怀和早期抗日斗争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此后，中共满洲省委积极组织和领导东北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派遣大批党员干部如杨靖宇、赵尚志等到东北义勇军各部

协助工作或到伪军中做策反工作；发动工人和爱国青年学生参加抗日部队；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此外，还先后在磐石、海龙等地建立起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1933年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日时，东北义勇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中央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关注和重视。待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该报告中提到“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在致朱德的电报中，又将“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列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

北以来取得的八大成就之一。

而对于东北抗日队伍来说，早在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初始，毛泽东的理论与著作就已开始在东北民众及反日游击队中流传。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军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韩光后来回忆道：“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使用于抗日战场。”

东北地区各抗日武装及其领导人，力求将这些抗日理论同东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更加坚定抗战的意志和信念。

二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在1937年8月22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其中就提到“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亦是实现全面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

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1938年2月,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肯定了杨靖宇、赵尚志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斗争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自1938年下半年起,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伪军加紧对抗联部队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切断了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抗联处境日益恶化,并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在1938年之内,抗联人数由3万余人锐减至5000人,到1940年底,仍然

留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抗联队伍合计起来已不足1000人。两年间,杨靖宇等数万东北抗日将士壮烈殉国,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亦几乎丧失殆尽,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完全失去组织联系。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尤其是抗联队伍的状况,在1939年初的中央书记处抗联工作研究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

而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努力获取党的重要文献,自觉学习党的思想路线。1939年10月12日,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在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五年来北满反日运动之发展》中写道:“我们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些文件中所指示的任务而斗争,并将这些文件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规范。”1940年3月,冯

仲云历经艰险,将“我们往后抗战中的经典”——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送往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与全体将士手中。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还以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起草抗联后期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要求抗联干部“加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斗争学习,应该以毛泽东、朱德做榜样”。

1940年底至1941年,由于环境极度恶劣,各抗联部队遭遇巨大困难和挫折,不得不分批越境进入苏联进行整训,准备在时机成熟时重返东北。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抗联主力部队不得不暂留苏联。1942年夏,留苏抗联部队整编为抗联教导旅,并不断派出小分队进入东北实施作战和侦察任务。

1945年大反攻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毛泽东多次对东北抗联作出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正确评价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抗联教导旅在这一时期积极学习贯彻中共七大和毛泽东相关



东北抗日联军的密营



周保中(左四)与苏联军官合影

理论及精神,为配合反攻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消息传到驻苏境内的抗联教导旅,教导旅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时任教导旅旅长的周保中阐述了抗联反攻东北的基本政治立场,确立了坚持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执行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尽快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等抗联反攻东北的基本原则。1945年9月初,抗联部队陆续分批从苏联返回东北,并在清除日伪残余,迎接关内主力部队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9月20至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陈云在沈阳听取了周保中、冯仲云等关于东北抗联14年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接受了移交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档案材料及组织关系,与组织失散多年的东北抗联终于重新回到了

党中央的怀抱。

此后,抗联部队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同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抢夺人民胜利果实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东北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寸土必争的方针,投入到伟大的东北解放战争中。

三

对于东北抗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毛泽东曾阐述道:“我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月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此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

1949年5月,毛泽东在起草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时曾评价:

“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的(地)为党工作。”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历史贡献的关怀和肯定,同时亦指出抗联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要求抗联同志们勇于总结和自我剖析。上述关于东北抗联的阐述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抗联进行评价的基本原则。

1958年,党中央在通化市靖宇陵园为牺牲在东北抗日前线的东北抗联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杨靖宇举行万人公祭安葬仪式,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向杨靖宇敬献了花圈。在悼词中,中共中央对杨靖宇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杨靖宇同志的英勇奋斗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任何困难都不能把他压倒。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他热爱人民,和人民真正打成一片。他善于团结群众,能够把各族人民为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原东北抗联同志担任省部(军)级及以上领导职务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就有周保中和冯仲云、韩光、李延禄等近30人,他们和其他抗联同志一起,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奋斗终生。(题图为美术作品《东北抗日联军》)

(责任编辑:孔晓莉)